



民族研究文选

谷苞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民
族
研
究
文
选

谷
苞
著

责任编辑 陈重秋

封面设计 麦克汗

民族研究文选

谷苞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第二测绘大队新技术服务部激光照排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3插页 30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7—228—01919—7/D·138

定价:5.80元



谷苞同志近影

目 录

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1)
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19)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35)
各族人民共同的意愿	(47)
当前民族学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57)
当前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67)
论充分重视和正确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民族问题	(76)
民族史研究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89)
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 ——为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出版一百周年而作.....	(100)
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	(123)
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	(138)
清朝为什么将西域改称新疆.....	(148)
为什么不能把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	(153)
三十一年来新疆的社会变迁.....	(157)
略谈古代龟兹乐舞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172)
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	(178)
维吾尔族的今昔.....	(191)
论民族与宗教.....	(202)
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	(216)

我对近年来有关无神论的一些议论的看法·····	(232)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尊重和保护宗教	
信仰自由·····	(242)
需要正确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255)
记王震同志关于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的几次谈话·····	(263)
德业文章、风范长存·····	(272)
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	(278)
南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情况·····	(303)
南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	(320)
疏附县一区三乡解放前的封建集团与政权组织·····	(338)
三年间·····	(349)
旧传统和新变化·····	(364)
兰州旧事杂忆·····	(383)
附录: 谷苞自传·····	(406)
后 记·····	(422)

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一

目前,中国境内有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 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多种矛盾,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则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不愿作亡国奴,从东北黑龙江流域,到蒙古草原、新疆、西藏、云南、两广、台湾以及祖国沿海沿江各地,我国各族人民都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血战,用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保卫了列祖列宗遗留给我们的神圣领土。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各民族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的共同名称的开始出现及其溶入人心,对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外抗强权,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在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搬掉了压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各族人民抚今追昔,对各民族共同的族名——中华民族这一名称,自然怀有特别的亲切感和自豪感。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的提出,并为全国各民族所乐于接受,虽然是近代的事,但是它的渊源却是长久的。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秦和汉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在汉朝统治下的民族就有汉、匈奴、东胡、乌桓、鲜卑、丁令、西胡、小月氏、羌、氐等族以及西南夷诸民族和百越诸民族。就我所知,“中国人民”这一名称的提出,首先见于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就是说,中国人民的提出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货殖列传》所说的中国人民,实际上包括着汉朝所设郡县内的各个民族。我想,后来中华民族这一名称的提出,是对司马迁所提出的中国人民这一名称的继承和发展。

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所独有的鲜明的民族特点与特长,同时又有着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之点,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485 页至 486 页)中华民族是以具有勤劳勇敢的美德而著称于世的,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这个多民族祖国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形成及其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当中,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从而产生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协作的关系。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是有许多共同

点的。第二,移民和民族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两段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不要把民族看死了,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东西。”又说:“所以我们要站得高一点,要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变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又是由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情况复杂。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民族历史。”(见《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第二期)

上面所引的两段话,说明了中华民族现存共同点,所以会出现这些共同点,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移民与民族融合造成的。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居于汉族聚居区;一种是有大量的汉族移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另一种是有大量的某一少数民族移居于另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也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一种是有大量的汉族分别融合于许多少数民族;另一种是有大量的某一少数民族与另一个或另几个少数民族相融合。

历史上少数民族大量移居汉族聚居区的次数和人数都很多,后来大都与汉族融合。如在西汉时有大量的新疆少数民族移居于今陕西境内,从而当时的上郡设有龟兹县,雍州醴泉县北有温宿岭。原游牧于河西地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所部约四万人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属国。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氏等族大量进入我国北方,分别建立过各自的政权。以后历经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特别是元、清两朝,更是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居于汉族聚居地区。历来人们在这方面的论述甚多,这里就不多述了。由于在长期的历史中,先后多次有为

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所以不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各个不同时期的汉族并不是相同的,秦汉时期的汉族,不同于南北朝时期的汉族,南北朝时期的汉族不同于隋、唐时期的汉族,隋、唐时期的汉族也不同于元、清时期的汉族。民族本身总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汉族的发展符合这一法则。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上也有为数众多的汉族移居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当中的全部或大部分融合于各个少数民族之中了。在历史上汉族移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军队屯垦而留下来的;有的是被掳掠去的;有是逃难谋生去的;有的是由当时的政府组织去的移民;有的是汉族的投降官兵;……等等。在汉朝时期匈奴游牧区境内的汉族,多数是被掳掠去当奴隶的,少数是自愿前往谋生的贫民和投降的汉族官兵。

公元499年至640年,建国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麴氏高昌国,是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他们的祖先原本是汉魏时屯垦的汉族士兵和晋朝时逃难到此的汉族难民的后代。但是在这个时期这些汉族都已经融合于当地的少数民族了,他们的服装语言等都改变了,虽然还读汉文典籍,但是“虽习诵之,而皆为胡语”了(《北史·西域传·高昌传》)。另外,在《大唐西域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中所记述在新疆境内许多汉族人也都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了。

再就云南省来说,在历代也都有大量的汉族移入。首先见于记载的是,在战国末期楚国的庄 带领数千楚人迁到滇池附近定居。以后的许多朝代,都有许多汉族人迁居云南,特别元、明、清三朝迁入的汉族人更多。“明代以前,云南境内的汉族大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云南省的汉族,都是明清以后迁入的。

汉族融合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情况,不仅见于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我自己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多次亲眼看到。1946年

我在甘肃南部洮河流域进行社会调查时了解到,当地的藏族家庭只留一个儿子在家里劳动,其余的儿子都被送到寺院出家当喇嘛了。这样,留在家里的人口女多于男,有些藏族姑娘与藏族男青年结婚了。有些藏族姑娘便与到藏族地区谋生的汉族青年结婚了。这种情况在当时被叫做“吃兵马田”。所谓“吃兵马田”,就是指与藏族姑娘结婚的汉族青年,可以领得一份属于土司的土地耕种,同时又负担着两种义务:一是,一接到土司发出的“鸡毛文书”(征兵的文书,上贴一鸡毛表示火速的意思),就必须自带马匹、武器应征去当兵打仗;二是必须向土司交纳各种贡赋并向所属的寺院交纳雨粮(因为天下都被认为是出于佛爷的保佑)。这样的人家所生的子女,就都成为藏族了。他们从婴儿时起就说的是藏语,生活也都完全遵从藏族的风俗习惯。1950年,我到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天我在疏勒县城的一个茶馆里吃茶,碰到了几个维吾尔族青年正在用维吾尔语讲《三国演义》,好奇心使我与他们攀谈了起来。才知道他们的祖上男方都是清朝在疏勒县的汉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维吾尔族妇女。他们热情地约我到他们的家里作客。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房屋的建筑、庭院内花木的布置、室内的陈设,男女的服装,以及他们热情好客地以奶茶、馕、瓜果等招待我的情况,都与我在其他维吾尔族农民家庭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还有一点差别的话,就是我在他们当中的一家看到了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这也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陈迹罢了。

民族间的移民和民族融合,不仅发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各个少数民族之间。根据我四十多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的印象,这方面的情况也许是更多的。民族学家向零(侗族)在为《月亮山地区民族调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写得很好。他说:“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不断发生,有汉变苗,水(族)变苗和侗变苗的。变化的原因,有因通婚而变,有因避难而变。有个别人变,有整村整寨变。例如计划公社加去寨的韦

姓现有 153 户,据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水族,到此地后才变成苗族的。目前,在某些生活习俗中尚留有水族习俗的痕迹。孔明公社汉族占该社的 8%,现仍正在苗化,他们除在家说汉话及仍在七月十五日祭祖外,所有习俗全部同于当地苗族。……月亮山区民族间的关系,他们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具体事例,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很有帮助。”

由于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在我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些新的民族,如白族和回族就是这样产生的。关于白族的产生,在《云南古代民族史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唐、宋时期,迁到云南的汉族人民大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一般称为白蛮,形成今天的白族。”(见该书 1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回族的产生,在《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回民族是 13 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并吸收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成份以及别的成分,融合、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民族。”(见该书第 124 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是顺乎自然地产生和发展的。它是由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各民族的历史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各民族的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它们都是受变化法则所支配的。旧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使用续家谱的办法撰写民族史,这是不可取的。他们总是以凝固的观点看待民族,埋头于从书本到书本,从书中出书,无视活生生的现实,忽视了在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发展与变化。直到现在,还不能说这种观点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比如有的专著和论文中,还说湖南省有某某民族,并说他们的祖先是在元朝由新疆迁到湖南省的。可是这个民族早已主要融合于回族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通用汉语、汉文,只应称他们为回族,而不宜再称他们为某某民族了。又如,有些论文中说,在湖北省和河南省还有好几万某某族,并说他们的祖先是在元朝时由蒙古草原迁居到湖北省和河南省的。

可是这个民族老早已与汉族融合了,其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与汉族基本相同,甚至完全相同,只不过在传说中还留下了一点对往事的记忆。如果仍以他们的远祖的族别来判定他们今天的族别,就未必再是适宜的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把一两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说成是某一个民族或许多个民族的共同祖先的说法,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完全背离了作为民族学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不光是那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要生儿育女,和那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同时代的以及其先人们也都是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说穿了,这种用续家谱的方法撰写民族史,无非是英雄史观在民族学上的一种表现,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界线。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种族则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突破并且继续突破着种族的界线。

三

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特长。在历史上是这样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时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时期,我国各民族的特点和特长都必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建国以来的事实更加证实这一点。

我国各民族的特长的荟萃,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缔造,我国各民族都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中国各民族特点与特长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发展,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某个或某些民族的特长,一旦为全国各民族或许多民族所接受,就变成为共同的特长,亦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了。

在今天,汉族文化中实际上包括着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的文

化,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吸收的。这一点在下文中我们将扼要加以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发展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由于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 93.3%,又由于汉族的聚居区自然条件如气温、雨量等地理条件等是比较优越的,汉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汉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起了比较大的进步作用。对我国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如上所述,我们是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的。即:既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进步作用,又要看到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更大的进步作用。我们认为一点论的说法,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民族团结。

关于我国各民族的特点、特长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系问题,下文我们将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节日等方面分别加以简要的论述,并先从语言文字说起。

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在我国,有些民族共同使用着一种语言文字,有些民族主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些民族没有文字,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汉文;有些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还同时使用一种或几种其他民族的语言。回、满、土家等族除保留着某些特殊语汇外,均使用汉语、汉文。白、羌、畚、京、东乡、保安、撒拉等族全部或差不多全部兼用民族语言和汉语,通用汉文。布衣、仡佬、侗、毛难、黎、畚、赫哲、鄂伦春、纳西、布朗、阿昌、普米、怒、崩龙等族也都使用或通用汉文。壮、蒙、维、苗、彝、哈、高山、达斡尔、乌兹别克、塔塔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除通用本民族语言外,都有一部分人能说汉语。有些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还使用一种或几种其它民族的语言。如:土族使用汉语和藏语;达斡尔语包括不少蒙语成分,大部分人能使用汉语和蒙语;瑶族中有五分之二的人分别使用苗语、水语、侗语和汉语;毛难族兼通汉语、壮语;拉祜族兼通傣语、汉语;布朗

族兼通佯、傣、汉语；阿昌族兼通傣、汉语；锡伯族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人能使用汉语、维语、哈语；锡伯族的知识分子能使用汉文的人比能使用锡伯文的人多得多。汉族也不是只讲汉语，世代杂居在东北、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除讲汉语外，也还讲蒙、维、哈、彝、苗、壮、傣等民族的语言。

在我国各民族间，相互借用词汇的现象是很普通的。这中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民族借用汉族词汇；一种是汉族借用少数民族的词汇；另一种则是某一少数民族借用另一个或另几个少数民族的词汇。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第一种情况。如：维吾尔族借用的汉族词汇有：馒头、洋芋、韭菜、花椒、凉面、醋（也叫阿其克苏）、亩、斤、两、通事（翻译）……以及共产党、解放军等大量的政治词汇。新疆及西北的汉族也借用了许多维吾尔族语汇，如海纳（指甲花）、馕（维吾尔族烤饼）、皮亚孜（洋葱）……等等。汉族与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借词，是不胜枚举的。

在我国每个民族除讲本民族的语言外，也还讲其他民族的语言，这是生活的需要决定的，是由于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决定的，尤其是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小聚居、大分散这一民族分布情况所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在这方面存在着两个特点：一个是全国性的特点，有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很大一部分能使用汉语、汉文，也有一些少数民族通用汉语、汉文；另一个地区性的特点，如在五个自治区和甘肃、青海、云南、贵州等多民族的省内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都分别能使用蒙语、维语、藏语、壮语、苗语、彝语等。在我国语言使用上，既存在着多民族的特点，又存在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解放后，我国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受到了宪法的保障；同时，少数民族中能够使用汉语、汉文的人数也日益增多。

说到经济生活，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吃、穿、用等方面都曾做出

过很大的贡献。齐思和教授曾写过《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一文(载《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阐述,很值得一读。我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为五谷。《周礼夏官职方氏》“其谷宜五种”(注指黍、稷、菽、麦、稻)。后来有些粮食作物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给汉族的。汉朝以后蚕豆(胡豆)、芝麻才从西域传入了内地。高粱,又名蜀黍、蜀秫。大概是首先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种植,晋以后才在全国普遍种植。据考证九经中没有“面”字和“糕”字。用麦磨面的方法,秦汉以后才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内地。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为黍、稷。《汉书·食货志》中说:当时富人“食必粱肉”,“贫者食糟糠”。粱为精细的小米(即精黍);糟糠为酒渣、谷皮,泛指粗粮。小麦是被列入粗粮的。麦饭是被看作“野人农夫”的食物。《急就篇》谓:“饼饵麦饭甘谷羹”。唐朝颜师古注“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据《后汉书·冯异传》载,光武帝在遭受危困时也曾食麦饭。当时的麦饭,是用麦屑做的饭,与后来用精细的面粉所做的面食是不相同的。当时把西域的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是指胡须多的人。《说文解字》中说:“面,麦屑末也。”晋朝束晰的《饼赋》中说:“然则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太平御览》卷860)。在东汉时把烤饼称作胡饼,意即胡人的饼,把面条、包子、饺、馒头等也都叫饼。后来,汉族又把制作面食的方法传给了其他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把肉包子称作馒头(上海人和《水浒传》中也叫馒头),把凉拌面条仍用汉语称作凉面,等等。

通过古代新疆的少数民族,西域的多种瓜果蔬菜也传入了内地,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副食品,如黄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葱(胡蒜)、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胡桃(核桃)、葡萄等等。西瓜也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的。葡萄酒、烈性酒(烧酒)、制糖技术也是由西域传入内地的。以

前我国内地的酒,都是含酒精成分较低的酒。

由于多种粮食、油料作物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以及磨面、制作面食的技术和多种瓜果蔬菜的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全国各族人民食物的品种,大大改善了营养条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说到衣着服饰,少数民族也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原来汉族衣着的原料主要依靠丝、麻和毛,用以织成各种丝织品、麻布、毛褐。在汉朝时期,新疆已使用棉布,到南北朝时天山以南的各个绿洲已广泛种植棉花了。种棉与织棉技术从南北两道传入内地,元朝和明朝时才在内地广泛种植了。起初,内地人对棉花很不理解,由于棉花的纤维近似羊毛,误认为是种在田里的羊长出的毛,被称为“种骨羊”。这也正是元朝耶律楚材在诗中很有风趣的所说的“无衣垆种羊”。由于种棉与织棉技术的传入内地,大大改善了各族人民的衣着条件。黄道婆推广织棉技术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而黄道婆的织棉技术是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

古代汉族的服装,上衣下裳,长领宽袖,行动很不方便。在平时劳动时不方便,在作战时更不方便。春秋时赵武灵王向匈奴人学习,采用“胡服骑射”,开始改革了汉族的服装。汉族所穿的旗袍、马褂是从满族人学来的。

在我国古代都是席地而坐的。通常有两种坐法,一种是“正襟危坐”,也就是跪坐,即膝盖着地,下腿向后,臀部坐在脚后跟上。直到现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仍然保持着这种坐式。一种是“箕踞”,也就是便坐,现在新疆的一些兄弟民族仍然保持着这种坐法。西北地区的汉族在炕桌上吃饭时也保持着这种坐法。席地而坐的座次是有讲究的,就我在哈萨克族毡房里所见,其座次顺序略如唐朝汉族“乡饮酒”的顺序。上述两种座式以及座次序的规定,究竟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来的,还是少数民族向汉族学的,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能妄加判断。